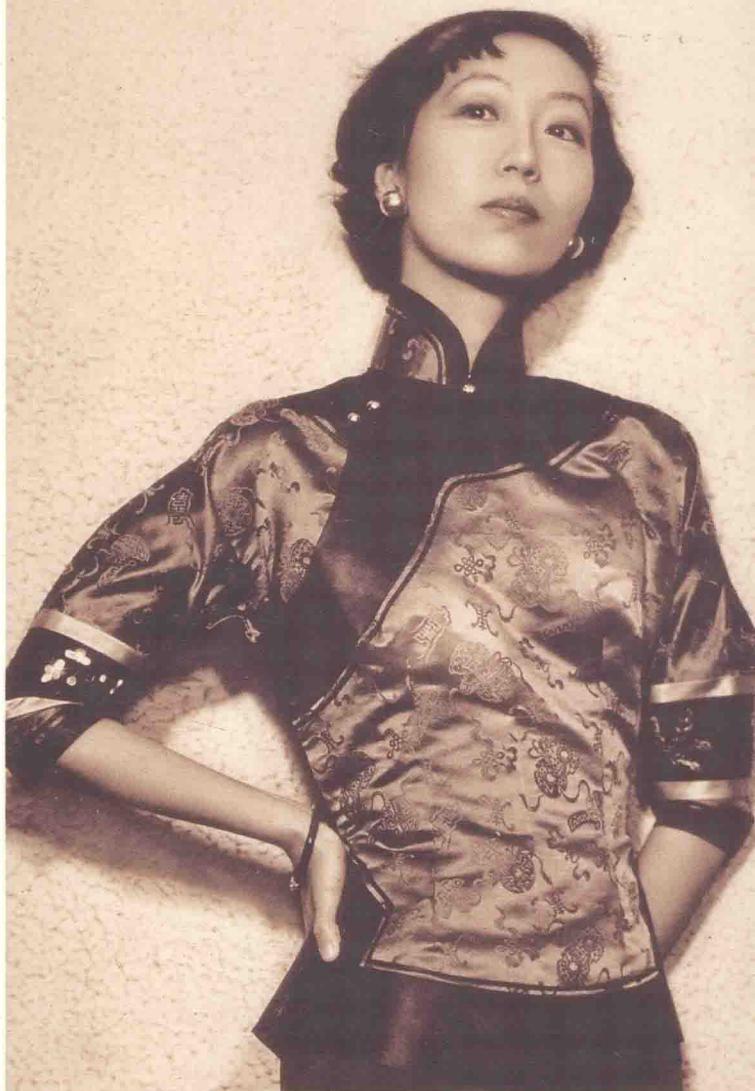


倾国倾城亦飘零

张爱玲

蒋心海 著



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，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，
我想许多人都是同感。然后崎岖的成长期，也漫漫长途，
看不到尽头，满目荒凉。



● ● ● ●



悠闲地生的年，愉快地度日如年。
我想，人都有困惑，然后聪明的成长期，也漫漫长途。
看不到尽头，满目荒凉。

倾国倾城亦飘零

张爱玲

【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】

张爱玲：一个时代的才女与她的作品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国倾城亦飘零——张爱玲 / 蒋心海著. —济南：
齐鲁书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33-2797-2

I .①倾… II .①蒋… III .①张爱玲(1920~1995)
—生平事迹 IV .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8067 号



倾国倾城亦飘零——张爱玲
蒋心海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<http://www.qlss.com.cn>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营销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58 千

版 次 2014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5 月 第 1 次 印 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797-2

定 价 36.00 元

笑，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；哭，你便独自哭。



1981年11月，上海《文汇月刊》发表了张葆莘长文《张爱玲传奇》，张爱玲遂以“传奇”的姿态重返上海。上海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，成名的地方，也是她遭遇乱世之恋并因之备受指斥的地方。1952年，张爱玲离开了带给她荣耀与痛苦的上海去了香港，从此之后她的名字和作品便在大陆销声匿迹。因此，当三十年后张爱玲再次“现身”大陆媒体，她身在上海的姑姑惊喜不已，即刻把登载《张爱玲传奇》的那一期《文汇月刊》寄往美国，告知她重回大陆的喜讯。

张爱玲的回归也勾起许多文坛故旧的回忆。1982年12月，《收获》杂志发表了柯灵的《遥寄张爱玲》，并重新刊发《倾城之恋》，《读书》杂志也遥相呼应，迅速转载了柯灵的这篇回忆文章。其后，张爱玲逐渐走进公众视线，其作品大量印行，阅读张爱玲也随之成为不断升温的文化时尚。

又是三十年过去，一代代“张迷”仍然如痴如醉地读着她写的书和写她的书；张爱玲研究也渐成显学，有关她身世的消息、文章、传记、电影等纷纷而出。这种持续不

衰的“张爱玲热”，庶几算得上传播史上的一个传奇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再写一本张爱玲传记，究竟是明智之举还是多此一举呢？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以一种“惊艳”的目光来看取张爱玲，试图从她身上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对生活的浪漫想象。在这样的心态之下，对张爱玲的书写与阅读日趋“传奇化”。所谓“贵族”的身世，“艳异”的爱情与生活，“传奇”般的成功和“乖张”的个性与行止，都成了人们聚焦的看点，或者干脆成了获取替代性满足的媒介物。而张爱玲真实的人生和内心的荒凉与落寞、焦虑与纠结，以及欢欣与哀痛，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、遗忘，甚至不同程度地改写。基于此，我们愿意以平实的态度，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张爱玲——一个以文字维生、历经苍凉乱世和坎坷心路的张爱玲。

台湾作家季季曾对张爱玲的一生作过一个简括的勾勒：“四岁母亲离家出国。十岁父母离婚。十四岁父亲再娶。十七岁被父亲监禁半年。十八岁逃出父亲的家。从童年到青春，一次次都是情感上的高压与生活上的高温之煎熬。二十三岁，扬名上海滩。二十四岁，情系胡兰成。二十五岁，情伤胡兰成。二十七岁，情碎胡兰成。三十二岁，离家去国。四十七岁，痛失赖雅。五十二岁，自我封锁。七十五岁，骨灰漂流太平洋。”（见张子静、季季《我的姐姐张爱玲》新版后记）透过她一生的遭际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：在表面的所谓繁华与浪漫、光鲜与诗意图背后，其实是走不完的坎坎坷坷，受不尽的内心煎熬。

面对张爱玲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对梦想的执著。她以文字成名，用文字来养活自己，文字成全了她，也给她带来苦恼甚或磨难，但她始终无怨无悔，不离不弃。在大洋

彼岸，在陌生的异国他乡，她仍在用文字垒砌着自己的文学梦想。文字成了她的宗教，也成了她的宿命。到了晚年，她把自己囚禁在寂清与孤独里，依旧痴迷地沉潜于文字，直到命回幽冥。人说女人是水做的，而张爱玲是文字做的，她为文字而生，亦为文字而死。

面对张爱玲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的独立与自尊。她一生都在逃离。逃离家族，逃离父母，逃离政治，逃离大陆和香港，逃离人群，也逃离跳蚤的啮噬；她用逃离来寻找独立，她用自立来搭建自尊，到了晚年更是以逃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在张爱玲的词典里，逃离不仅仅是独立、自尊，更是一种选择。她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，选择不断地逃离，最终成为了她自己。

面对张爱玲，我们亦悲亦喜。悲的是她命途多舛，孤独而终；喜的是她留下了璀璨至美的文字，留下了身后不朽的文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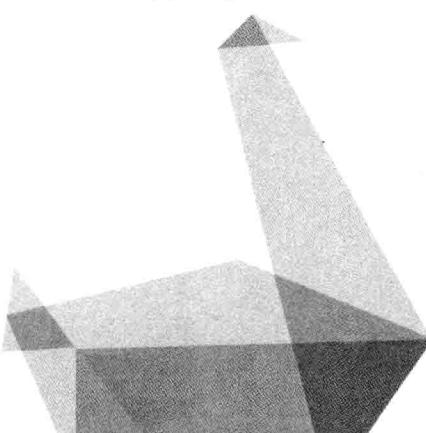
面对张爱玲，我们不悲不喜。她在乱世里灿烂，尘埃里开花，异国的土地上自由行走，走出了她自己的神采风韵，走出了她特异的独立不羁的生命姿态。

张爱玲是不可复制的，也是不可模仿的。面对张爱玲，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平庸与怯懦；面对张爱玲，我们只能怀着一份钦敬之情远瞻遥观，无需悲喜。

我们以这样的认知与情感，试着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张爱玲。



目 录



参考文献 / 254



后 记 / 253

前 言 / 1

上 卷 乱世人生 / 1

- 第一章 生命记忆 / 3
- 第二章 天才非梦 / 32
- 第三章 乱世传奇 / 59
- 第四章 流言人生 / 82
- 第五章 尘埃花开 / 102
- 第六章 出走香港 / 127



下 卷 异国飘零 / 147

- 第七章 梦寻美国 / 149
- 第八章 山重水复 / 164
- 第九章 独上红楼 / 183
- 第十章 柳暗花明 / 204
- 第十一章 咬啮之痛 / 223
- 第十二章 海上花谢 / 236



上卷

『亂世人生』(1920~1955)



第一章 记 命 生 忆

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，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，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。然后崎岖的成长期，也漫漫长途，看不到尽头，满目荒凉。

——《对照记》

记忆是五味杂陈的浆液，滴滴沥沥地注入每一个生命，于是生命便有了沉甸甸的内容，有了各自不同的姿态和色彩。

张爱玲最初的记忆，是“她站在朱漆描金的站桶里，头别来别去，躲避一只白铜汤匙”。她坚持要自己白瓷底上有一朵紫红小花的调羹，而不要那个铁腥气的东西。韩妈（保姆）不从，于是她便一次次泼洒了汤粥。而后，她突然抢过汤匙，把它“丢得很远很远，远到看不见，只听见叮当落地的声音”。韩妈说她今天脾气坏。那时她还不会说话，但是听得懂，很生气。

还有一次，她和弟弟并排坐在床上，面前搁着一只漆盘。大人们让她抓周。“她抓了笔和棉花胭脂，不过三心二意，拿起放下”。

这两件小事都记录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中。

圆》里。也许小说的记述不足为凭，而事实上尚不会言语的张爱玲也未必记得。但这两个细节并非可有可无，它至少表明，在她懵懂的孩提时代，已经凭了生命的本能，开始了自己的选择。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，张爱玲就是以这种执拗的自我选择，一步步穿越苍凉世事，一路悲喜歌哭，艰难跋涉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特异的人生，也成就了一曲独具风韵而又跌宕起伏的文坛传奇。

1920年9月30日，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，取名小煐。那一年，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一年，旧王朝的消亡只有8年，新生的民国正在打打杀杀中经历着艰难的蝉蜕，世道似乎更乱了。

在清末年代，张家算得上名门大族。曾祖父张印塘（1797～1854），曾出任安徽按察使，协助李鸿章办理“淮军”军务，并与之结下深谊。祖父张佩纶（1848～1903），23岁中进士，后擢升侍讲学士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年轻气盛的张佩纶踌躇满志，屡屡上书言事，纵论君国大计，纠弹失职官员，每“一疏出，朝野耸动”，成为当时官场中“清流党”的代表人物，与同号“清流”的张之洞、陈宝琛等官员一起，形成一股影响国是政局的政治力量。因此之故，张佩纶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訢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赏识。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亦曾对人说：“在华所见大臣，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。”正当张佩纶春风得意之时，中法战事爆发，他力主与觊觎台湾的法国海军开战，因而被主和派遣往福建马尾主持战事，结果惨遭败绩，被革职发配到察哈尔。充军期间，他以读书著述自遣，先后写成《管子注》24卷、《庄子古义》10卷，以及《涧于集》、《涧于日记》多卷。1888年戌满，投李鸿章幕，在署中协办文书。李鸿章赏识其才学，遂将长女李菊耦嫁与他做了第三任夫人^[1]。



李菊耦和母亲

相门千金的下嫁，无疑使张家的荣耀达到了极点。张佩纶为官清正，不事产业，家境并不甚好，李菊耦丰厚的嫁资，自然使张家的经

济状况大为改观。据说，李菊耦的嫁妆包括房产、田产、珠宝和现银，至于具体多少，无人知晓。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晚年说：“我祖父是个清官，一家子的财产都是由三祖母陪嫁过来的。”^[2]张佩纶婚后仍留任李鸿章府中。

李菊耦生得秀丽端庄，素有才女之称，夫妇时常月下对酌，品书读画。二人琴瑟相谐的日常生活情景，在张佩纶的日记中多有记载：

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。与菊耦手谈，甚乐。

合肥（李鸿章）宴客以家酿与余、菊耦小酌，月影清圆，花香摇曳，酒亦微醺矣。

菊耦偶有不适，煮药、煎茶、赌棋、读画，聊与遣兴。

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，以洞庭湖雨前之，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。兰骈馆小坐，遂至夕照街山时，管书未及校注也。

然而生活并不总是风花雪月。在相府中，张佩纶作为掌理重要文件的幕僚，免不了要对内政外交方面的事务发表看法，这在李鸿章那里，未必没有提携之意，但在别人看来就未免不够安分了。果然，1894年，张佩纶遭御史端良弹劾，说他：“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，屡招物议属实，不安本分；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，毋许逗留。”对此，李鸿章十分恼怒，但为平息众议，不得不让张佩纶夫妇迁出都署，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陪嫁。夫妇俩搬到南京，买下康熙年间靖逆侯张勇的一所旧宅，过起了赋闲的日子。在这所花木扶疏的豪宅大院里，李菊耦生下了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（字廷重）和姑姑张茂渊。

若是庸常之辈，能过上这样锦衣玉食的寓公生活，也算是差强人意了，然而这对恃才傲物的张佩纶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和煎熬。他本想在政坛上一展身手，却不想35岁就宦海潦倒；他亦曾寄望于岳丈大人的援手东山再



张佩纶像

起，结果被轰出了官场。这真是天不佑我，人岂可为！在梦里，他曾赋得一诗：“一叶扁舟一粟身，风帆到处易迷津。能从急流滩头转，便是清凉畛里人。”然而梦中的旷达怎敌得现实的严酷。在抑居南京的最后十年里，张佩纶抑郁难申，终日以酒浇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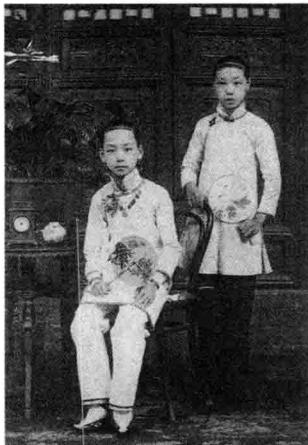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祖父张佩纶，张爱玲在《对照记》中有过这样的记述：

我仅有的一张我祖父的照片已经泛黄褪色。《孽海花》上的“白胖脸儿”在画像上已经变成褚红色，可能是因为饮酒过多。虽有“恩师”提携（他在书信中一直称丈人为“恩师”），他一直不能复出，虽然不断在幕后效力，直到八国联军指名要李鸿章出来议和，李鸿章八十多岁心力交瘁死在京郊贤良寺。此后他更纵酒，也许是觉得对不起恩师父女。五十几岁就死于肝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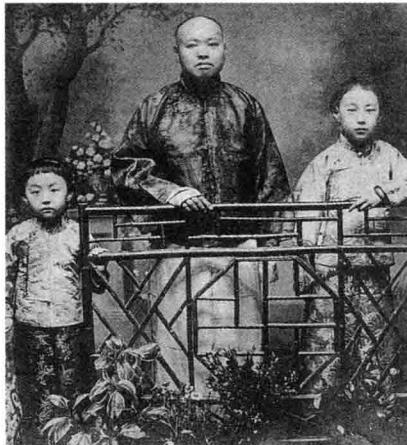
临死前，张佩纶对次子志潜说：“死即埋我于此。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，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。”生难酬壮志，死不归祖茔，张佩纶梦幻般的凄凉人生，为这个煊赫的家族留下了一抹深深的苍凉。

李鸿章死了，张佩纶也去了，张家从此走向了衰落。

20世纪的最初三年，李菊耦迭遭丧乱，1901年丧父，1902年丧兄，1903年丈夫也一病而死，这年她只有37岁。一连串的晴天霹雳，几乎把



黄逸梵及佣人



张爱玲二伯父、父亲和姑姑

这位当年相府里的娇弱千金击倒了，她心情沉郁，闭门不出，不久便染上了肺病。辛亥革命时，她带着一家人避乱青岛，1912年又迁居上海。刚安顿下不久，李菊耦就去世了，这年她才46岁，她的儿子张志沂16岁，女儿张茂渊11岁。当家人走了，张家的事务便由次子志潜来主持——长子志沧早丧，张志沂和张茂渊一直跟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兄嫂生活，被“拘管得十分严苛”。

1915年张志沂在上海结婚。妻子黄素琼（逸梵）亦非寻常人家，祖父黄翼升，原籍湖南长沙，曾和李鸿章一起效命曾国藩麾下，因平定太平天国功，擢升第一任江南水军提督，授三等男爵。二人的婚配可谓门当户对，两个人都是19岁，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，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，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。据说，当时的婚礼也是极尽奢华和排场，然而，无论婚庆的场面如何热闹火爆，都无法遮掩张家一族的颓势。

张家也好，黄家也罢，李家更不用说，都是富贵一时的名门望族，但是，随着风云一代的先后谢世或官场蹭蹬，这些曾经煊赫的家族开始走下庙堂。清王朝的覆亡又使这些家族的后人们丧失了正当的社会身份，变成了不尴不尬的遗民。与明末那些殊死抗争的遗民不同的是，这些世家大族的后人们似乎并不死心塌地地效忠前朝，尽管他们还煞有介事地遵行着旧朝的规矩。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，1919年为父亲张佩纶编刻了一部奏稿，“序言不仅在格式上每逢遇到‘孝钦皇后’（慈禧）、「德宗」（光绪帝）、「列祖列宗」字样均抬头，而且年份用的竟是‘宣统十年’，这一年按民国纪年应是民国八年了”，甚至“他们还一遵清俗，头上留着辫子，每逢朔望、元旦及宣统生日都要点上香，向北遥拜，然后则痛哭一番”。^[3]与其说这是对前朝的效忠，毋宁说是对先人过往辉煌的变相怀恋，也是面对自身生存处境而怅然若失的心绪流露。

在辛亥革命激流的冲击之下，他们彻底地滑向了社会的边缘，躲进了上海的租界——这是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，离中国社会最远的边缘地带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、李经迈，正是在民国初年避居上海，张家也是在1912年迁居上海的公共租界，黄家姐弟也不例外。他们既没有效忠前朝的热情，也没有拥抱新民国的冲动，因为他们坐拥先人留下的万贯家产，暂时尚无须为生计发愁。于是，遗少们无所事事更无所作为，便靠抽鸦片，

逛堂子，娶姨太太，混迹十里洋场来打发时光；小姐们则学着做淑女，赶时尚，努力保持着大家闺秀的身段，瞅准机会嫁个富贵人家了却一生。他们在租界这块治外飞地上，过着看似超然的世俗生活，在浑浑噩噩中坐吃山空。

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、舅舅黄定柱便是这类靠吃遗产为生的遗少。就拿张志沂来说，没有人知道他名下有多少遗产——据说张家大部分遗产为张志潜侵吞——但至少在 1935 年左右，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出租，另外还有为数可观的田产和古董。十余年之间，这些财产都成乌有了。诚如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所言：“我父亲任性，不善理财，不事生产，又爱摆阔挥霍。所有败家的本事，他无一不缺。”“父亲和后母都抽鸦片，光是这项开销就很可观。吃和行的方面，我父亲也极会享受。家里的伙食，每天鸡、鸭不断；咸鸭蛋只吃蛋黄不吃蛋白；炒鸡蛋要用鲜嫩的香椿芽，夏天一定要吃海瓜子。有时还要买外国进口的火腿、罐头芦笋和罐头肝肠等等。”“在行的方面，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以前都坐小汽车进出。只要看到新款式的进口汽车，他就卖掉旧车换新车。一九四〇年，他最后买的一部汽车，车款是八千美元。”“在酬酢方面，我父亲也绝无吝色。除了日常的应酬往返，每年春节过后喝春酒，场面也很可观。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请一批人，每次至少坐满两个大圆桌。吃饭、喝酒后，紧接着就是赌钱。通常要赌到第二天清晨才散，而且输赢都很大。”^{〔4〕}而他一生只到外面做过两次工作，且时间都很短暂。这样只出不进的日子，这样毫无节制的挥霍，万贯家产便很快荡尽了。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张志沂只得栖身于一间 14 平方米的亭子间里，在贫病之中聊度残生了。

对于张家的辉煌和败落，张爱玲的心情是复杂的。她无疑分享了张家大族最后剩余的一点福泽，但更多的却是承受了这个家族分崩离析的苦楚。生在这样的人家究竟是幸还是不幸，这恐怕连张爱玲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每当张爱玲说起这个家族的过往和不曾谋面的先人，总流露出些许淡漠与纠结。她在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《对照记》中说：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，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，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，看似无用，无效，却是我最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，当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”这似乎只是一种血缘上